

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

——那些脱贫攻坚中的奋斗故事

□ 新华社记者 谢锐佳 王长山 吉哲鹏 谢俊

“脱贫不能等靠要，齐心摘下贫困帽”“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出路”“撸起袖子加油干，脱贫致富当模范”……行走在天南海北，深山海岛，边陲村寨，一个个大红标语不时撞入眼帘，提醒着过往的人们：神州大地正在进行一场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或者有人会问，刷几条标语，喊喊口号谁不会？

其实，只要你靠得够近，扎得够深，就会发现，提气标语的背后，有一个个火热的拼搏场面。当一群人用勤劳的双手在做改变命运的突围。

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一年多。距离梦想越近，挑战往往越大，越需要只争朝夕：扶志扶智，选好产业，开拓思路……

开年伊始，春节前夕，请您随着我们的笔端，近距离看看各族人民脱贫致富的故事，看看劳动大众啃下一个“硬骨头”的精神。

扶志扶智，让内生动力汇聚成脱贫的磅礴力量

经过半个多月的培训，云南省镇沅县文旧村村民赵玉华拿到了人生第一张技能培训毕业证书，他的砌砖技术达到了中级水平，在当地打工一天可以挣到160元。现在一技在身，赵玉华精气神都提了起来，对未来充满信心。

镇沅大多数村庄山高路远、偏僻闭塞。因缺技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致贫的贫困户占47%。其中，年轻力壮、无灾无病的贫困人口有2100余人。

只有解决素质贫困问题，才能实现真正脱贫。镇沅2017年成立深度贫困人口培训中心，对2100余名农村“闲汉”进行培训。培训让大家学到了技术，将脱贫压力变成致富动力，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目前，学员已成功转移就业458人。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出路，群众迸发出的内生动力如同大海波涛，冲刷掉了贫穷的印迹。

虽然冰天雪地，但在海拔4000米的四川理塘县，亚火乡亚火村巴绒一家人没有猫冬的样子——忙着翻地，忙着修建牲畜棚圈，为开春后蔬菜种植、发展养殖做准备。

巴绒曾是村里的贫困户，过去就盼着帮扶干部上门。看到身边的人都在使劲干，看到政府对贫困户出台的多种优惠政策，巴绒坐不住了，种起了蔬菜，养起了牲畜。

去年9月，奋斗苦干的巴绒获得“四川省脱贫攻坚奋进奖”，他笑着说：“靠自己的双手，终于摘掉了穷‘帽子’。感谢乡帮扶干部和村‘第一书记’多次到我家，一次次谈心谈话激发了我脱贫的信心和动力。”

作为海拔4000米的“世界高城”，理塘县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不断引导贫困户树立主体意识，从思想上“破贫困”，从行动上“快脱贫”，促进农牧区群众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转变，投身干事创业。目前，全县已组建农村专业合作社117个，14个乡镇20个村建起集体牧场，户均增收2000余元。

用好外力，激发内力，才能形成持久发展的合力。在云南西双版纳基诺山乡，虽家家贫困、家人患病，巴朵村小组基诺族妇女李晓慧并没有被压垮，在乡里支持下创办村淘自力更生，让电商的触角在山村扎根。

基诺族红米、干腌水、豆豉粑粑、小耳朵猪干巴……前些天，她又约着几个同村妇女，创办了基诺族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要把这些山货卖到山外去，换来致富上好日子。

选好产业，村民自动告别“等靠要”

前不久，“红薯老总”张诚跑到郑州，参加中国薯业博览会，一心想引进更适合家乡种植的红薯品种。

今年44岁的张诚是贵州省思南县周寨村人。1993年，他从建筑学校毕业后，只身在贵阳打拼，奋斗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发家致富没忘本，看到家乡落后面貌未改，他盘算着为乡亲们做点什么。

2016年，张诚回到村里，领着周寨村红薯粉加工厂，建立以红薯加工企业为平台的红薯全产业链。

目前，张诚的加工厂年吞吐鲜薯7.5万吨，产值达2.25亿元。

“家乡有这个产业真是好，现在我们就就近上班了，一个月工资3000多块。”周寨村邻村的贫困户杨琴说：“过去一个月只有1800块收入，现在的工资还吃住都包。”杨琴一脸满意。

产业好不好，关键在对路。周寨村沙地多，适合种植红薯。村主任杨仕杰说，全村1299人中还有179人未脱贫，“脱帽”就靠这个产业了。

群众增收快，全靠产业带。“红薯老总”的加工厂通过建设1000亩示范基地，还可以解决200多名村民就业。此外，带

动全县13个乡镇，包括5000多户贫困户在内上万户种植红薯20000多亩，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

好产业激发了村民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劲头。周寨村66岁的贫困户杨胜强是土家族，红薯加工厂运行起来之后，他在厂里上班，每个月有2500元工资。“最近厂里给我发了5000块，顶好几天大猪肉。”他笑着说。

泥巴房、竹片房，云南西双版纳基诺山乡小普希村民小组以前守着古茶林受穷，全村曾经全是贫困户。70后村民者扫帚头发展茶产业，采茶、制茶、卖茶，把一度无人问津的古树茶变成了“黄金叶”，自己也从全村最穷变为“首富”。

“有了好产业，不用你做思想工作，村民都会自动告别‘等靠要’。”小普希村民小组组长白春国说。看到身边的致富榜样，村民纷纷加入了发展生态茶的大合唱，收入年年攀升。现在，小普希全村已脱贫，水泥路从国道直通村里，硬化路连着各家各户，自来水引到灶头，村里15户人家就有小汽车11辆。

开拓思路，激发群众无穷的创造力

“蜜样的幸福生活滋润着我，拉胡人纵情歌唱……”未进老达保寨，嘹亮的歌声已响在耳畔。

歌声盈村，一墙墙炮仗花开得红红火火，云南普洱市澜沧县老达保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牡帕密帕》的保护传承基地之一，能歌善舞是村民们的“标签”。

“我们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可这又换来什么钱！”偏远闭塞、交通不便，又没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子，贫穷如影相随，曾让村民李石开和村民们苦恼不已。

20世纪80年代，李石开外出首次听到吉他弹唱就动了心。回家后，他卖猪买了老达保寨的第一把吉他，拉开了村民“吉他生活”的序幕——越来越爱唱爱跳的拉伕族村民“玩”上了吉他，老达保吉他声越传越远。

县里也“听”到了老达保的吉他声，顺势扶持引导。2013年，支持老达保成立由全体村民持股的老达保快乐拉伕演艺有限公司，修了演艺广场。现在，490多名村民中有200多把吉他，从六七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登台演出。

唱歌跳舞也能挣钱！这个“吉他上的村寨”从此老老少少没了闲人，乘着脱

贫攻坚的春风，走出了独特的文化脱贫之路。光靠唱歌跳舞一项，村民人均年收入就达四五千元。

房子翻新，栽花草，铺了石板路，立上缀满音乐元素的标识路牌，昔日尽是茅草房、残片房的破旧寨子一下子变得“艺术时尚”，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一睹200多把吉他齐奏的盛况，体验老达保人的快乐幸福。

“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可你不去干就不行。”说话中气十足的李石开快乐藏不住，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自己用卖猪钱换的那把吉他，已成为发展的见证物，被送进了博物馆。

思路一开，群众就有无穷的创造力，发展的路子就变得宽阔。不只是歌唱跳舞，就连世代耕作的田地 and 居住的村庄，也成了脱贫致富的“好帮手”。

在黄河中游的山西省永和县奇奇里村，55岁的刘宁富早早起床，正在箍两口新窑洞，准备扩大民俗旅馆，迎接今春旅游旺季。

奇奇里村是一个只有193户村民的黄土高原小山村，多年来，农民靠贫瘠的土地辛勤劳作但只能维持温饱。

其实，这里紧靠黄河乾坤湾，站在山上能一眼尽收7道弯。村第一书记郭若桥转变思路，利用当地独特地理位置和民俗特色，让奇奇里村吃起了文化旅游饭。像刘宁富，将家里的一口旧窑洞改造成特色民宿，一年就挣了2万多元。

短短几年，这个昔日既穷又偏的贫困村迅速翻身，前年宣布整村脱贫，现在全村人均年收入达到7000元。

不仅奇奇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000多万，每年都有1000万以上的人口摆脱贫困。

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战略再接力。永和县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农村，脱了贫的奇奇里村也得到新的扶持。刘宁富正是瞅准了这个新机遇扩大民宿规模，还把在外打拼的儿子喊回来帮忙。

“脱贫是我们迈向乡村振兴的第一张通行证，我们下一步将深挖黄河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深厚文化，打造文化品牌，通过做强旅游产业富起来。”郭若桥说。

一个在贫困中挣钱的村庄，一个个驶上小康道路的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昂扬向上的精神呈现在世人面前。

（参与记者：潘洁、汪军、吕梦琦、黄海波）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左权：愿拼热血卫吾华



左权同志（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长沙1月16日电（记者 阳建）在湖南醴陵市，有一条“左权路”贯穿城区。每每走在这条路上，人们不禁会想起已牺牲70多年的左权将军。这位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

左权，1905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学时代参加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是“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黄埔军校教导团任排长、连长，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同年12月赴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先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1931年12月奉命参与联络指导国民党军第26路军举行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5军团后，任红15军政治委员，后任军长兼政治委员。1933年后，任中革军委一局局长、红一军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左权参加长征，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1936年，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西征并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任八路军第二总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粉碎日伪军“扫荡”，取得了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战役的胜利，威震敌后。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严密细致的参谋业务、扎实的工作作风，深受朱、彭的赞扬。1940年秋，协助彭德怀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11月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行黄崖洞保卫战，经8昼夜激战，以较小的代价歼敌千余人，被中央军委称为“‘反扫荡’的模范战斗”。他还“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从1939年至1941年，他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论军事思想的原则》等文章40余篇。左权为创建并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大人民抗日武装，为八路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

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延安和太行山根据地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称他为“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并赋诗悼念：“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黄河大合唱：振奋民族精神的不朽力作

新华社西安1月10日电（记者郭强）“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诞生于1939年的《黄河大合唱》，以磅礴的气势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英勇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谱写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抗日图景。

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船工家庭的冼星海，自幼酷爱音乐，学习小提琴和钢琴。1929年，冼星海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主要研习作曲。抗战爆发后，已经回国的冼星海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救国军歌》《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大量歌曲。

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延安鲁艺副院长沙梅和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信，热情邀请他前往延安鲁艺担任音乐系主任。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冼星海携夫人钱韵珩于1938年11月初抵达延安，开始在鲁艺任教。

诗人光未然曾与冼星海进行过多次合作，为他创作歌词。1939年1月，因为在前线受伤，光未然来到延安疗伤。冼星海前往医院看望他，两人达成了再次合作的意向。

几天后，光未然把冼星海与演剧三队的同志们请到他居住的窑洞里，在一盏昏黄的油灯旁，年轻的诗人用低沉的声音朗诵了《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谣》等作品。诗人的激情感染着窑洞里的每一个人，在诵咏声戛然而止的瞬间，冼星海噌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上前一把抓住歌词，激动地大声喊道：“我有把握把它写好！”

回到居住的土窑洞后，冼星海开始夜以继日地谱曲。他完全进入了一种难以抑制的精神状态，长时间不休息，偶尔躺到床上抱头沉思一会儿，很快又从床上猛然蹿起，继续谱曲。整整六个昼夜，冼星海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

这部作品分为八个乐章，以黄河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坚贞不屈、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在冼星海看来，《黄河大合唱》“直接配合现阶段的环境，充满气、愤恨、悲壮的情绪。歌词本身已尽量描写出伟大黄河的历史”。

《黄河大合唱》延安首演指挥郭昕零在其文章中回忆：“3月31日，我从星海手里得到《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清稿。它是星海抱着病在短短的几天内连写带抄完成的，怪不得我刚才回队路上感到它是沉甸甸的，那本清稿凝聚着作曲家多少辛劳，多少心血，多少友情。”在完成全部曲谱的十几天后，《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鲁艺大礼堂进行了首演，获得巨大成功。

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音乐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100多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刚一唱完，毛泽东就连声称赞：“好！好！好！”

当晚，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今晚的音乐会是新中国前的音乐会，我永远不能忘记今天的情形。”不久，回到延安的周恩来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从此，《黄河大合唱》从延安传遍全中国，传向世界，成为振奋中华儿女获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精神力作。

弘扬民族精神 奋斗精神

改革先锋风采

茅永红：社区建设与治理创新的“拓荒者”



2018年12月19日，茅永红载誉回到百步亭社区。
新华社发

新华社武汉1月2日电（记者李劲峰）佩戴着“改革先锋”奖章回到武汉后，百步亭社区党委书记茅永红就收到社区居民送上的鲜花。“这个奖章归功于百步亭的所有居民，大家都是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他说。

23年前，放弃公务员身份下海，到海

南创业“淘金”的茅永红，带领团队回到武汉，进驻江岸区百步亭。

“那时房地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开发商建完房子卖掉后，不参与后期小区管理，业主之间，业主与物业之间矛盾重重。”茅永红当时就决定，既要盖房子，更要建社区。

向社会学专家求教后，茅永红在百步亭建设中探索“建设、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的社区建设模式，创建起全国首个不设街道办事处的小区。

陈日新：披荆斩棘闯新路



这是工作时的陈日新（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太原1月2日电（记者王井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首个最大的中外合作项目——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落户山西朔州。在这块“试验田”上挥锄耕耘的，是原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陈日新。时至今日，他种下的“种子”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

1981年10月，时任山西煤管局副局长的陈日新负责组织筹建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项目。

1982年初，当人们还在庆祝春节时，陈日新带人在一个农场租了几间房子，挂上“平朔煤矿筹备处”的牌子。随后，在当地人称为“鬼火滩”的地方，打下了平朔煤矿的第一根界桩。

万事开头难，唯有闯在前。建设新

煤矿时，中外合作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没有合同，没有“红头文件”，拿不到银行贷款。几经筹措，终解燃眉之急。

在那个人们对可口可乐都十分好奇的年代，与外国企业家共同开发煤矿，面临各种观念的冲突。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外国管理人员在矿区里活动，必须有中方人员陪同，外国人很不理解。陈日新对同事们说：“人家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和我们共事，我们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他们提供方便，使他们安心工作。”

安太堡煤矿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联合管理委员会”，中外双方各派代表组成。1985年，陈日新任联合管委会主席，主持联管会工作。

在陈日新的努力下，中外合作的安太堡煤矿进展“神速”。1987年，安太堡露天矿建成投产。这座现代化煤矿从动工兴建到竣工投产，只用了短短26个月，相当于当时我国百万吨煤矿建设周期的四分之一。在这一过程中，陈日新引进借鉴外国先进管理经验，创造了一整套管理机制，形成了高效率、高科技、高效益、快节奏“三高”的平朔模式，推动了我国煤炭工业露天开采水平大跨越。

今天，由安太堡煤矿发展而来的平朔集团是我国主要的动力煤基地和国家确立的晋北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多项指标位居全国领先水平。

2007年12月，陈日新去世，享年75岁。